

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

马戎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在一定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条件下，经过几千年的漫长过程才逐步形成的。费孝通教授的演讲使用了大量考古、语言、人类学等方面的事实，对这个过程作了清楚的说明。下面我想沿着费先生的这个思路作些补充和发挥。

一、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三个阶段

我们可以大致地把这个基本格局在整个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这一格局的形成时期。费先生肯定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论和本土说。根据考古的发现，可以说明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大地上，在远古时代就逐步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民族集团和文化区。这些民族集团又经过了长期的相互交往、征战和融合，到秦汉时期形成了并立和相互依存的南北两大统一体，分别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各自主要的经济活动。之后，或者是北部游牧民族集团部分或全部地征服南部（如南北朝时期和元朝），或者是南部农业民族集团把北方游牧民族远远赶向漠北和中亚（如汉、唐王朝的全盛时期），只有到了清朝中叶，汉、满、蒙、回（主要指新疆各少数民族）、藏等各大民族集团统一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才真正结合成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实体。这对统一祖国、奠定祖国的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应当指出，“统一”本身也是个发展的概念。统一体中各部分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由于中原王朝自秦汉以来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一”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各边疆民族集团“封建化”的过程。

满族兴起在我国东北部，那儿可以开垦出肥沃的农田，有丰美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满族的生产活动起初是以狩猎为主，兼营畜牧业，后来逐步发展了农业。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满族是介于农牧两大统一体之间的民族集团，它既能理解中原农业民族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文化和民族心理，也能理解北方游牧民族；一方面大量学习吸收汉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北方狩猎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满族最终能同时被两方面所接受。而在历史上，无论是把华北农田变成牧场的元朝王公，或是奋力把匈奴部落驱向漠北的汉武帝，只是凭靠武力逞一时之雄，都没能做到把中华民族的农牧两大集团真正地结合到一个实体之中。

第二个阶段是这个格局的危机时期，大致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一百年。当多元一体格局于清朝中叶最终形成之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这个民族统一体就面临着新的危机。危机首先来自海上的帝国主义侵略，英国和法国是这一侵略的急先锋。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势力急剧衰落。随后沙皇俄国和新兴起的军国主义日

本等也参加了瓜分中国的行列。他们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鼓动少数民族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

在这个危机时期，在经济上由于西方先进生产力和商品的冲击，中国传统的生产组织和经济活动受到沉重的打击；在文化方面西方价值观和基督教也伴随着商品进入了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失败，中国一再地割让领土，以致部分少数民族脱离了祖国。辛亥革命以后，满清王朝崩溃了，全国陷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分裂状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依旧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第三个阶段是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的重建时期，即是自1949年至今的这个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民族集团又重新统一起来了。这一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努力重新缔造一个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与以前都不同的新的“多元一体”结构。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进步，首先从立法上确立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然后为了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平等）制订了一系列扶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中国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的制度，以保障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新中国的统一与封建皇朝制度下的统一有质的不同，是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一。而旧中国的统一是在民族压迫制度下的统一，统一的趋势往往伴随着压迫和反抗。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虽然其间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我国各少数民族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当然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但总趋势是团结而不是冲突，是统一而不是分裂。香港、澳门不久即将回归祖国，台湾海峡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统一的大趋势。

二、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

原来的多元一体格局之所以会出现危机，主要是由于中华民族所在的亚洲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在近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目前重建这一格局的历史条件与当年初创这一格局的历史条件是很不相同的，其主要的不同点可以归纳为三点：

1. 在鸦片战争之前，汉族在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生产技术、文化教育各方面，在发展水平上均高于各少数民族。满清王朝虽然由满族建立，但基本上保持了汉族的传统文化，汉语在实际上仍是通用语言，儒教伦理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使各少数民族集团存在着仰慕汉族的很强的向心力。在经济上，各少数民族都可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中原汉族农业地区的产品，“茶马贸易”是牧区各族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补充。在行政上，中原王朝的行政体制是复杂和有效的，并拥有强大的武力，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往往仿效内地的行政组织形式，但始终无法在军事上与中原王朝长期竞争。在文化上，中原地区的文学、医学、教育、绘画、手工艺品、音乐舞蹈、冶金、陶瓷、建筑、种植技术……等各方面都很繁荣，长期被各少数民族视为文化中心，那时不但中国各少数民族仰慕中原王朝，连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的学生都以到中国的京城学习为荣。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进入亚洲大陆，体现出它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方面优于汉族文化。这样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圈内，西方文明成了一个外来的新的文化势力，在中国的各民族集团（也包括汉族）面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现在许多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学习英语和其它外语，反映出他们已不满足于汉文出版物所能提供的知识。虽然在历史

上中国的邻邦中也曾存在着其它的文明中心（如印度），但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集团总的来说承认汉族文化的优越。现在连汉族都在积极学习欧美语言，我国各少数民族集团或早或迟也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开放、学习、改革的大潮中来。过去单一的文化中心已变成多元的文化中心，汉文化在各方面已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文化的向心力已大大削弱了，在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时，与历史上相比，这是客观条件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2. 在历史上，无论是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形成之前的南部统一体还是这一格局形成之后的整个中国，基本上是以汉族为核心组成了一个行政上多层次的中央帝国。汉族省份是这个帝国的腹地，有着严密的行政管理机构，直辖于皇帝。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行政组织就松散一些，一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被任命为地方官吏。在邻近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区域（如内蒙古、川西、青海、云贵、广西），则是通过本民族的世袭王公贵族、土司头人来治理。再往外层，地方政府的权力就更大一些，如西藏即是由地方噶厦政府治理，中央只派驻藏大臣来实施监督。最外一层是清王朝的藩属国，如当时的朝鲜、琉球、安南等，是独立的国家，但向清朝纳贡并承认清朝为其宗主国。由于当时在各少数民族和各邻国中对于汉文化的向心力很强，这种行政控制权力层层淡化的结构，即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自鸦片战争后，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四周有了强邻：东面是侵占了朝鲜的日本，南面是侵占了安南的法国，西南是侵占了印度和缅甸的英国，北面是吞并了一系列中亚小国的俄国。为了抗御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战争，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控制需要加强，需要重新调整原来多元一体格局在行政制度方面的原有形式，转变成一种核心地区（首都和重要城市）控制紧、边疆地区控制紧、中层地带控制松的行政管理结构。但是进行这样的调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努力经常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不满，因为他们传统上享有的自治权力被削弱了，这必然会对多元一体结构的重建带来困难。

3. 在历史上，为了保持以中央皇朝和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定，需要保持中原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优越地位，使各少数民族始终处于落后地位。这实际上是明清两朝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目标。这种差距在客观上确实加强了文化的向心力，有利于当时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定。

但是，现在的中央政府则必须认真考虑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如何使它们现代化的问题。如果汉族地区与各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是在逐渐扩大，这种情形在今天非但不能巩固向心力和稳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反而会加强离心力，造成这一格局的解体。在近年我国实行改革的过程中，沿海各汉族省份经济上发展很快，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迅速扩大，这一趋势令人十分忧虑。正因为对这种局面的担心，自1985年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各民族共同繁荣”。如何在高度竞争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使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个民族集团都能走上现代化之路，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所面临的新问题，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十分有限，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

总结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重建我国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汉族与各兄弟民族之间，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间的行政、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因之而需要在许多方面作必要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一个长期稳定和不断发展的多民族共同体。

三、我国各少数民族怎样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

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当时党的民族政策比较实事求是，各级干部比较廉洁奉公，军队纪律严明；同时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废除了奴隶制、农奴制等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制度，使各少数民族的大多数劳动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在这种形势下，党和中央政府在各族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各民族的向心力曾一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可是后来在“文化革命”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发生了许多破坏少数民族文化，迫害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事件，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损害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削弱了各民族的向心力。当前面临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各少数民族应当怎么办？出路在哪里？这是各少数民族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非常关切的问题，也是所有关心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有识之士为之十分焦虑的问题。

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祖国大家庭的团结与进步。那一个时期的民族团结比较巩固，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就快一些。那一个时期各民族之间不团结，就会被外部势力利用来削弱整个中华民族以谋取其利益。以为外国力量会真心诚意帮助某个民族发展起来而不掺杂其自私的战略或经济利益的考虑，只是缺乏历史常识的、极其幼稚的幻想。

当前的形势要求中央政府既要有远大的战略设想和宏观的理论，又要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步骤与方案，要能做到各少数民族对自己的发展速度和相应的社会、经济成果感到满意。总结建国四十年来中央政府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措施，大致可以归为三条：一是派干部去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同时积极培养民族干部；二是在财政上、物资上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开支和建设事业；三是在那里逐步进行社会改革，推行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的行政、经济、教育体制和政策，这些体制和政策被认为在汉族地区是行之有效的。这些作法的实际效果如何，需要认真细致地加以总结。

派一批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工作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建国初期，为稳定形势和推动社会改革，是绝对必需的。但考察这种作法是否成功的一条是看这些少数民族是否在汉族干部的帮助下涌现出一批自己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要有觉悟、有能力、懂政策，尤其重要的是要在本民族广大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由于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本民族群众对中央政府某些政策可能的反应；他们可以帮助避免出现政策失误；同时一个民族如没有自己的领袖人物，这个民族在心理上就无法恢复平衡，很难振奋精神。在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各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在维系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集团的关系方面都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建国以来，中央政府给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补贴数量相当大，可以说是少数民族地区地方行政开支和建设事业资金的重要来源，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事业的关心与支持。这种作法的后果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中央的财政支持下，这些地区的基本建设事业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对中央在财政上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性。这显然不是当初实行财政补贴政策所希望产生的后果。对于这种结果，提供资金的汉族地区不满意自不用说，接受资金的少数民族也并不满意。如我国东北的鄂伦春族，基本上是国家

拿钱养起来了，每个成年人或是成了国家职工，或是以“护林员”名义领到生活补贴，但他们的情绪很低落，因为这种依赖性使他们有一种失落感，看不到自己民族的前途。小民族是这样，大民族也是这样。如中央对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支持对西藏发展经济的实际推动效果如何，广大藏族群众怎样看待这些财政资助，都很值得总结。在经济上，没有压力和动力、没有创造欲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

政府在五十年代强调要照顾少数民族及其聚居区的特点，提出在制度与政策上允许少数民族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后来在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观点和作法，在“文革”时期甚至否定民族特点的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作法得到了纠正，但在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着错误的观念。他们没有认识到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存在的长期性，不顾历史条件片面地强调民族融合，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民族中都应是一个模式，不然就是削弱、违反或者破坏了社会主义。这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汉族的政治经济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在行政制度、生产组织、教育体系、文化艺术形式等各个方面用汉族的模式来“发展”各少数民族，认为与汉族一样了，就算是发展进步了。其实这是一种狭隘和片面的发展观。在汉族地区行之有效的体制和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一定行之有效，更何况我国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个民族的文化、宗教、社会组织形式等都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怎么可能用一个民族的发展模式（包括其形式与内容）去改造其它民族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只能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吸取其它民族发展中的经验，走出自己的路。这条路既有普遍性（如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又有特殊性（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历史）。

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应当是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战略目标。这一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许多切实可行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措施。由于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与汉族相差很大，在制定具体政策时，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很可能不一致，所以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考察历史、了解现状、总结经验、积极地探索使各少数民族发展的新道路，并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这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这方面，社会科学家们可以具体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呢？

1. 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根据历史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延续的，这个格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哪些形式，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危机。

2. 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状，找出它们各自的特点，研究目前促进和阻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探讨各民族发展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3. 在以上两项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间各种关系在新形势下应作的调整。譬如，（1）在行政方面如何处理好地方自治权与中央权力这一对矛盾，一方面要有一定程度的集权以维系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又要给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以满足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2）在经济方面如何在新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体系中重建一种新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从传统的“茶马互市”转变到新的商品市场体系，建立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某种新型的分工合作关系，形成在“互利”基础上的“谁也离不开谁”的新体系。

(3) 在文化方面如何形成一种积极的多元一体格局。仅举语言为例,一方面要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使用一种通用的语言以适应商品流通和传播科学技术的客观需要。其它方面如干部政策、税收政策、人口政策等等都是需要研究的专题。

4. 结合对各民族发展道路特点的研究,总结建国以来中央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区域自治、财政支持、行政与生产组织、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政策的实际效果,提出改进意见。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的产物。经过了几千年的相互交往、征战和融合,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也正因为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凝聚力,才能够渡过困难的危机时期,迎来了各民族携手并肩向着现代化道路前进的新形势。今天,无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而妄想分裂祖国的人是徒劳的,同时无视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长期性、不顾各民族的特点而想用一种模式来“发展”少数民族也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多元一体格局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客观现实。无视或者轻视这个现实,不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做到共同繁荣,就谈不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费先生提出“多元一体”格局这个思想,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特点,并与当前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这个思想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的学术领域,对当前少数民族研究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为了了解日本对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以推动国内禅学研究和中日两国佛学领域的学术交流,我校哲学系于3月27日至31日举办了中日禅学研究研讨会。应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日本正式代表为日本驹泽大学的五位教授。列席研讨会的还有驹泽大学副校长、著名中国佛教史学者阿部肇一教授和佛教民俗学学者峰岸孝哉教授,原北大留学生、现驹泽大学讲师中条道昭等。现正在北大留学的驹泽大学博士生小川隆和东京大学博士生辛岛静志也参加了会议。国内则有各地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的佛教学者约五十余人。

研讨会听取了日本驹泽大学五位学者所做的专题报告。这些报告是,冈部和雄教授:“中国佛教的研究状况和问题点”,田中良昭教授:“敦煌禅籍的研究状况和问题点”,石井修道教授:“中国唐宋代禅宗史的研究状况与问题点”,永井政之副教授:“关于元明清时代禅宗的研究与展望”,大谷哲夫教授:“日本曹洞宗研究状况及问题点”。

透过这次日本学者的学术报告,使我们注意到了日本佛学研究中的几个新的特点:1. 注重印度、西藏佛教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动机之一,是追求所谓“真正的佛教”,发现中国佛教与佛教本义的不同。例如石井先生介绍的一种看法:西藏发生的撒姆埃的摩诃衍与莲花戒的论争中,摩诃衍的中国禅因为不是真正的佛教所以败北,并认为西藏的佛教传承了佛教的正法。冈部先生也指出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的研究正带来新的冲击。2. 注重研究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中国化问题,这是与第一个特点有关联的问题。例如冈部先生介绍的肇论研究情况,日本学者十分注意肇论中的老庄思想,因为这涉及了僧肇是否歪曲了佛教思想本质的大问题。同样,整个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的传译与传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3. 注重研究日本禅的特色。这个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对道元禅的研究上。石井先生一方面指出道元禅或日本禅与中国禅的不同,一方面又暗示道元禅或日本禅更加接近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4. 开始注重研究元明清时代的佛教和禅宗。这方面特别注意研究佛教和禅宗的民俗化问题,以及对道教、儒教乃至一般小说和随笔中发掘资料。此外,近年来还注意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永井先生在报告中,就建议两国联合进行实地的调查。5. 注重将实证性的研究与对义理和思想的研究相结合。冈部先生在其报告中,列举了日本佛学研究的五大弊端。①偏重教理史、教学史,②文献至上主义的研究,③从宗派的视角观察历史的倾向,④从三国佛教史观进行肤浅的解释,诸如“佛教在印度播种,在中国开花,在日本结果”的看法,⑤微观研究的全盛。然而,从五位学者的报告中可看出,这些弊端已开始为多数日本学者所自觉。上述四个新特点可以说都是这种自觉的成果。那种认为日本重微观,中国重宏观,日本重资料,中国重义理的看法,现已不足以概括日本佛学研究的实际了,相反这会有碍我们对日本学术成果的关注和吸收,事实上,对日本资料上的长处,我们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续东)